

無法確定的事情。

在另一方面，北平能够與第三世界建立較莫斯科更好的關係，因為它是一個亞洲的而非歐洲的強權，並且它本身也是一個較落後國家。在心理上，這種情形造成對中共的較易接受及對地區性問題更親密的認同，同時還有蘇聯難於表現的一種心領神會的了解。

有一句中國的諺語說：預測難，預測未來更難。不過，我們對未來的發展可以做出以下的概述。在未來，第三世界可能分裂為溫和派及激進派。在這種情形下，蘇聯將支持前者，而中共將支持後者。

這與驅使北平走向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的意識形態要求，是相符合的。我們將能看到中共以金錢或其他方式支持企圖癱瘓並推翻政府權威的恐怖行動，就像今天義大利所見的情形一樣。在較落後國家中這是如何地更容易達成，是不需要說明的。

華盛頓與北平的關係：三個層次的分析

張京育

一 全球形勢中的華盛頓與北平關係

一九六〇年代末，由於國際體系業已劇變，北平與華盛頓重新評估了他們的地位，於是在東亞發生了一場外交革命。

一系列快速發展的事件，諸如，蘇聯於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莫斯科宣布布里茲涅夫主義以加強共黨國家的馬列主義教條，中共蘇分裂的惡化以及蘇聯核武器襲擊中國大陸的可怕威脅等等，促使中共重新考慮其同時視美國與蘇聯為主要敵人的政策。北平與莫斯科的關係已大為惡化，北平仍然視美國為其主要敵人。直至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侵入捷克瓦爾察克的自由政權，六十年代中期，蘇聯是一個比美國更危險的敵人。其後，蘇聯的壓力不斷加大，迅速增強沿中蘇邊界的軍事力量，並於一九六九年八月於新疆西北邊界發生大規模的衝突。蘇聯同時使中共明白，無論與中共發生何種戰爭，核子武器都將介入。為了抗衡蘇聯的威脅，中共除了運用傳統策略外，同時試圖與很多其他國家改善關係。當然，美國最為重要。在北平的策劃中，美國將被用來抗衡蘇聯^①。

註① Robert G. Sutter, *China-Watch*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68-97.

同時，美國的政策也已劇變。尼克森甚至在就任總統之前即已見到一個因北平莫斯科分裂所導致的比較複雜的世界，與北平華盛頓互動的可能^②。他就職後，美國政府誓言降低美國在亞洲的軍事角色。美國逐漸消除其與中共貿易的障礙。華盛頓認為與北平聯繫有助於美國軍隊從中南半島作較體面的撤退，有助於與蘇聯在軍備管制及其他問題上達成協議，同時有助於與蘇聯達成一個實事求是的關係。

就在這樣一個新的國際背景下，季辛吉與尼克森跑到了中共。

結果如何呢？首先，一些人士辯稱，對中共敞開大門使美國在中南半島終於「光榮地」停戰，並使美國與蘇聯能夠簽訂各種協定。其次，中共政權對於有關美國及美國盟邦的問題，有較佳的表現。因此，北平施加於美國的壓力與敵意已降低。第三，蘇聯似乎已採行較穩健的政策，以免造成一對四的局面，也就是美國、西歐、日本與中共共同對付蘇聯。第四，美國的政策使北平莫斯科間分裂繼續下去，莫斯科沿中蘇邊界集結了四十五個師，降低了西歐戰線上的蘇聯壓力。

回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美國對中共敞開大門所獲致的「成就」顯然越來越令人懷疑。不錯，美國已從中南半島的戰爭中脫身，但是南越已陷入北越之手，距停戰協議的簽訂尚不到三年。這應歸功於北越兩個盟友——蘇聯與中共——的政治與軍事援助。美國對蘇聯的和解政策，由於蘇聯介入第四次中東戰爭及其單邊干涉的威脅，發生了動搖。蘇聯對西歐的政治壓力稍稍降低，或許是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結果；然而，儘管兩個共產巨物的敵對性維持不衰，蘇聯在歐洲的軍事優勢照樣增長不已。蘇聯毫不猶疑地干涉非洲。尤有進者，美國對蘇聯與中共執行和解政策的方式已引起美國與其盟國間的不信任與不和。因此，美國對中共開放後，美國有沒有獲得以及獲得多少全球性利益，是一個令人懷疑的問題。

再從全球權力均衡這一點看，一些美國的中國觀察家一直主張充份的「關係正常化」，也就是美國與中共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以鞏固北平華盛頓的關係，並防止北平與莫斯科修好。他們相信，這兩個美國的敵人間任何真正的修好，無論對美國的單獨利益或對西方世界的整體利益皆是有利的。

因此，巴奈特於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日向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事務小組委員會報告說：若以為在鞏固華盛頓與北平關係上，無論美國決定作什麼或什麼也不作皆不致使中共重新評估其對兩個超級大國的政策，乃是一個「極其有問題的和暗藏危險的臆測」。他相信，如果中共斷定（一）美國不能或不願意有效地阻止蘇聯的擴張主義或（二）美國不願意按照北平的條件與北平建立外交關係，那麼他們將重估其對外政策戰略。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領袖「可以決定採取一個較為獨立的和彈性的政策，縱橫捭闔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利用其與一方的關係迫使另一方讓步。簡言之，他們可以在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試行一種近似等距離關係的政策。如果他

註② 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67), 111-125.

們將如此做，他們也許會小心地、藉着某種相互妥協的有限緩和和政策、探求消除蘇聯威脅與降低中（共）蘇緊張的可能性^③。」巴奈特相信，「正常化」如果不及時按照北平的條件完成的話，北平與華盛頓關係可能急劇惡化。

利用中共制衡蘇聯是改善華盛頓北平關係犧牲中華民國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應予分析。雖然美國政府一開始就聲明，與中共改善關係不是爲了對付蘇聯，但是美國的學者與政府官員却喋喋不休地談論抗衡與抑制蘇聯的「平行利益」。若說，莫斯科與北平間的分裂對美國有利，也許是對的。但是，利用中共抗衡蘇聯的效用有待探討。就軍事言，中共太弱，與蘇聯不成對比，即使在中蘇邊界地帶也不成對比。它缺少把軍隊運離本土的能力。所以，當一九七六年蘇聯插手安哥拉，美國決定不予抵制的時候，中共早已放棄競爭。中共與蘇聯在開發中國家爭奪勢力，誠然不錯。但是，一旦美蘇進行軍事攤牌，中共的效用實在有限。

此外，美國的主要目標之一乃是降低其與蘇聯間的緊張情勢、緩慢軍備競賽的速度、與減少大規模戰爭的可能。由於美國與蘇聯這兩個國家有相互毀滅與摧毀全世界的能力，他們不得不設法和平相處。目前，正努力達成一項限制戰略武器協議，以作爲導向真正裁減軍備的第三回合限武談判的前奏。如果莫斯科理解到，美國正利用北平作爲對付蘇聯的力量，蘇聯領袖不會心生警覺嗎？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同意降低他們的軍備水平嗎？如果美國、西歐、日本與中共將組成一個廣泛的聯盟，蘇聯會採取溫和政策而不採取好戰態度嗎？美國一些人士正耽於華盛頓與北平建立軍事聯繫這一想法，這難道會改善和解與軍備限制的前景？如果蘇聯採取反制行爲，例如支持北韓攻擊南韓，美國將會如何反應？中共將會站在美國和南韓的一邊，或站在蘇聯與北韓的一邊？這一事件發生後，美國與中共的合作能否繼續存在^④？

即使我們承認這一假定：中共可以被用來制衡蘇聯。中共願不願意受美國擺佈？如果美國試圖利用「中國」這張牌抑制蘇聯，中共也可能試圖用「美國」這張牌來擋開蘇聯的威脅。所以，最近幾年來，北平一直在指控美國與蘇聯在進行大國「勾結」，攻擊蘇聯與西方間的慕尼黑式的協議，並鼓勵北大西洋公約國家增加戰備勇敢地對抗蘇聯。易言之，中共的戰略概念是備戰，而不是尋求戰爭。他們寧願「坐山觀虎鬥」。這就是他們反對美國與蘇聯和解的原因，他們認爲美國同蘇聯和解就是投降。

在國際事務中，中共不贊成「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說法。他們的「三個世界」理論是基於這一概念：組織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對第一世界——超級大國——的霸權進行鬥爭。他們非常現實，他們深知，其實力過於薄弱，不足與兩個超級大國同時爲敵。因此，鄧小平表示，美國也應加入國際反蘇統一戰線。

事實上，中共的戰略一貫如此：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現在，美國是中共的次要敵人，但是在下一階段中將成爲主要敵

註③ A. Doak Barnett, "On the Road to peking," *The Asian Mail*, Vol. 2, No. 1 (October 1977), 19.

註④ Edward Luttwak, "United States Policy: Between the Two China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1977.

人。一位「中國觀察家」曾作出如下的觀察：

「細讀北平國內與對外宣傳，可以發現一個連續不斷的反『美帝』運動。中國兒童研讀附有粗劣插圖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訟揚韓戰中反抗『美國鬼子』的英雄功績。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勝利的官方社論稱頌蘇聯人民，但對美國的貢獻絕口不提。描述美國的生活時，則使用種族不和、經濟悲慘及資本主義罪犯等陳辭濫調。在聯合國，中共的立場始終反對美國的立場，在諸如韓國等特定問題上如此，在諸如世界糧食與能源等一般性問題上亦復如此⑤。」

即使中共黨徒自己也公開承認：

「當然要先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先去對付共同的敵人——也就是美蘇兩霸，但是在兩霸中又要區別開來，要不，逼人太甚，就會把兩霸逼在一塊，那就棘手。所以要分主次，這叫各個擊破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身負對外關係責任的耿飴，講得尤其露骨：

「將來時機成熟，自然瓜熟蒂落。眼前也好，讓美國來替我們守一守抵擋蘇修的勢力，守住東海邊，讓我們有更多的力量對付北邊的勢力，致力於『國家建設』，等到有那麼一天我們認為時機成熟時，我們會開誠布公：請山姆大叔捲起包袱走⑦。」

兩年之後，中共外交部長黃華重述了這個觀點：

「必須團結第三世界，爭取第二世界，又利用第一世界兩個超級大國的裂痕，去分化他們，瓦解他們，不使兩個超級大國取得默契，相互勾結，從臺底交易轉而聯在一起瓜分世界。爭取美國過來，集中力量先對付頭號敵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⑧。」

因此，非常明顯，華盛頓與北平間改善關係的主要理由是由他們對俄國的共同憂慮。但是，一些美國的權威人士有掩飾中共與美國間重大差異的傾向，他們高談把中共引入國際社會的需要，闢論冷卻北平革命狂熱的希望，並修言與中共簽訂核子協議。有的時

註⑤ Allen S. Whiting, *China and the U. S.: What Next?*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Headline Series, No. 230, April 1976), reprinted in part in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 No. 1 (October 1976), 13.

註⑥ 喬冠華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及中共對外政策的講話 (Chiao Kuan-hua's Talk on Current World Situ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May 20, 1975),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Classified Chinese Communist Documents: A Sele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8), 396.

註⑦ "Keng Piao's Talks on 'A Turning Point in the China-U. S. Diplomatic Rel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XIII, No. 1 (January 1977), 130-131.

註⑧ "Huang Hua's Report on the World Situation," *Issues and Studies*, Vol. XIV, No. 1 (January 1978) 111.

候，他們爲了向美國人民推銷新的北平華盛頓關係，甚至非常樂觀地公開陳述毛澤東政權所自我宣傳的慈悲性質^⑨。

對中國共產黨黨徒而言，對華盛頓敞開大門祇是一個技術性的與臨時的步驟。這並不是說，當今的華盛頓北平關係不能維持多久。這一點有賴蘇聯威脅的性質與程度、中共的權力狀況、以及美國抗衡蘇聯的效力。當美國及其重要盟友日本等的關係不再受到中共政權攻擊之時，有些人深感安慰，而北平毫無問題祇希望「美國維持足夠力量以退阻俄國，直到北平不再需要美國就能達到此目的時爲止^⑩」。如果美國人的駐防對抑制蘇聯壓力有助，北平則希望維持下去。一旦無此需要，則要求其離去。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對日抗戰期間，中共一面偽裝與國民政府合作，一面打擊國民政府。他們從未放棄以武裝革命在中國建立共產政權的最後目標。

中共黨主席及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其最近向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及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所作的報告中，正式宣稱：

「美蘇兩霸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⑪。」

「美蘇兩霸……仍在加緊爭奪世界霸權，瘋狂推行艦略政策和戰爭政策^⑫。」

「中美兩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兩國對於當前國際形勢中的一些問題也有不少共同點^⑬。」

中共遵行「一戰線策略，經常致力於組織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對付主要的和最強大的敵人。因此，華國鋒在其對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長篇引述列寧的話說：

「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只有盡最大的力量，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

註⑨ 例如，曼斯非爾德參議員於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共後報告說：「城市清潔、秩序井然、安全；店舖內食品衣服及其他物品充裕；警察顯然祇用於管制交通……一種自由自在的感覺充滿在人與人之間，且含有一種平易的平等主義氣度……公社……是社會組織的新概念，其作用在把中國古老家庭制度的相互依賴精神發揚光大，引進由很多家庭合作與集體勞力的公社之內……簡言之，中國已成爲一個有活力的現代社會，以過去爲基礎，迎合當前的需要，爲未來提出一個根基深厚的希望。」

以上引自 Oscar, Gass, "The 'Normalization' of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Review* (April 1978), 34.

註⑩ Donald Brandon, "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 *World Affairs*, Vol. 138, No. 2 (Fall, 1975), 94.

註⑪ Hua Kuo-feng, "Political Report to the 11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Review*, No. 35 (August 26, 1977), 41.

註⑫ Hua Kuo-feng,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delivered at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February 26 1978," *Peking Review*, No. 10 (March 10, 1978), 36.

註⑬ 同前，頁二九，強調線係作者所加。

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集團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益對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儘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⑭。」所謂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與有條件的同盟者，自然是指美國而言。

最近美國有一個調查，幾乎可以說明，一個強大的中共絕對不符合美國及其東亞盟國的利益。下面是兩則有關的問題及其調查結果^⑮：

中共說，它有意於經濟發展並至二〇〇〇年時成爲一個主要強國。如果中共於二〇〇〇年時成爲一大強國，你認爲是不是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

是的 百分之十八

不是 百分之五十八

不知道 百分之二十四

中共急於阻撓蘇聯在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力量與影響力的增長。雖然我們與中共間存有根本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差異，你認爲美國應該幫助中國（中共）增建其軍事力量，或是我們不應如此幫助中國（中共）？

幫助中國（中共） 百分之十一

不幫助中國（中共） 百分之七十

不知道 百分之十九

由此可見，十個美國人中有六個覺得另一個共黨強國的出現，乃是有損美國利益的發展。十個美國人中有七個反對協助中共增強軍事能力以對付蘇聯。簡言之，「試圖通過軍事方面的協助以運用華盛頓莫斯科北平三角關係與利用中（共）蘇分裂，遭到壓倒性的反對^⑯」。

儘管如此，在美國依然有人想利用中共對付蘇聯。他們無視於這一事實：共黨俄國與中共雖然相互爲敵，但仍然是美國的敵人

註⑭ 華國鋒，同前引「政治報告」，頁四一。

註⑮ Ralph N. Clough, Robert B. Oxman and William Wat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merican Perceptions and Future Alternatives* (Washington D. C.: Potomac Associates, 1977), 29-30

註⑯ 同前，頁三〇。

①。他忽視這一可能：利用蘇聯對中共的畏懼心理而對蘇聯施加壓力，實際上可能使其立場變得強硬或者激起其反制行為^②。有些美國人士主張儘快與北平關係「正常化」，甚至可完全接受北平的條件，因為他們深深擔心北平與莫斯科可能和解。在他們看來，如果北平與莫斯科彌補他們之間的差異，重修往日的真誠關係，那麼美國自身以及整個西方世界將面臨極大的困難。他們承認，蘇聯與中共極不可能恢復五十年代早期的親密關係。雖然如此，他們說美國必須加強其與北平的關係，以防止這種事情發生。

我認為，蘇聯與中共的分裂太深，分裂的原因太複雜，即使可以彌補，也不至於在可預見的將來發生。歷史的、領土的、權力政治的以及意識形態的差異導致了莫斯科與北平的分裂^③。這些差異，沒有一件消失。有些觀察家會猜想，毛澤東之死是否可使北平莫斯科關係和解；蘇聯或許也會懷有這樣希望。但是，一切現象似乎暗示，中共黨徒繼續執行毛派的對外政策。華國鋒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因其高舉毛澤東的旗子而能確保，因此他不能夠變更反修正主義路線。鄧小平於一九六三年七月率領代表團參加莫斯科會議，這一會議導致這兩個共產黨的公開分裂，他決不是一個親俄份子。事實上，鄧小平與西德聯邦國防委員會主席溫拿談話時曾預測，北平與莫斯科間的分裂可能繼續幾十年，在他的有生之年，直至在華國鋒（當時五十七歲）有生之年不會有所改善^④。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蘇聯建議進行雙邊談判，以便擬定一個維持莫斯科北平關係的原則性聯合聲明，三月九日北平予以拒絕^⑤。毛澤東死後，蘇聯僅作了短期沉默，然後對毛死後的領導恢復攻擊。蘇聯不肯從外蒙及沿中蘇邊界撤退軍隊。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真理報」對「使數千公里廣陣面上的蘇聯人失去保護」這一想法表示極大憤慨。同時，布里茲涅夫在蘇聯國防部長陪同下視察西伯利亞，檢閱軍事基地的部隊，重提早期蘇聯人民捍衛邊疆所作的犧牲，並與地區指揮官們討論了「備戰狀況」^⑥。因此，未來的北平與莫斯科關係也許會徘徊於有限和解，冷戰與有限武裝衝突之間。極不可能回復到五十年代的親密同志關係。大規模戰爭亦復不可能，因為這種戰爭無利可言，且代價太高。中共將繼續試圖改善其與蘇聯的權力對比形勢，爭取西方國家與日本的支援。蘇聯將交互使用利誘與威逼政策，誘使中共較為「理性」。在這種情況下，無需擔心北平莫斯科會真正和解；也無需

註① Brandon, 同⑩, 頁八七—八八。

註② 關於這一個問題：「美國可否利用蘇聯對中國（中共）的畏懼，在限武談判與非洲問題上對蘇聯施加壓力？」，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週刊的莫斯科通訊員奈特（Robin Knight）最近曾這樣說：「在我看來，限武談判經驗是，每當你對俄人施加這種壓力，他們的反應適得其反；他們變得更加強硬。如果美國開始試用這一策略對付他們，他們就將更

加快速地建造軍備。這是一個危險的招式，無法肯定，他們會因此更受到抑制。」原載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1, 1978), 33。

註③ Donald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New York: Atheneum, 1964)。

註④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路透社」與「法新社」北平報導：文匯報（香港），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註⑤ "Peiping Rejects Moscow's Oliver Branch, *China News*, March 21, 1978)。

註⑥ See "Russia and China: What Dispute?" *The Economist*, (April 8, 1978), p. 58.

爲使他們繼續分裂而付出昂貴代價。

另一方面，北平將要與能够向莫斯科接近的時機則爲：北平已按自己的條件獲得了美國的外交承認之時，以及其經濟與軍事力量藉技術與資金的獲得而大爲改善之時。在這些條件下，北平已不太需要華盛頓，因爲那時它將能單獨處理所謂「臺灣問題」，華盛頓再也不是一個障礙。尤有進者，如果中共的對比形勢獲得改善，那麼他們就能够與蘇聯在更加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談判，獲得較爲公平的討價還價的可能。所以，縱然莫斯科北平關係有其內在的動力，不大受外力的影響，但是在未來，美國的政策却可大大增進這兩個共產巨人親近的可能性。

二 華盛頓北平關係·區域性層面

自從五十年代初期韓戰結束之後，美國對東北亞政策是抵抗共黨軍事擴張與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與經濟秩序。由於美國與日本、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間有了堅固的安全協定，東北亞一直維持一個和平局面。在美國的軍援下，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現在擁有極爲強大的防禦力量。在美國的經濟援助與自助下，日本、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被視爲奇蹟。事實上，如果把東北亞共黨統治的社會與非共黨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政治趨向相互比較，在自由與福祉方面，非共黨社會顯然優於共黨社會²³。美國的關切及參

註²³ 華盛頓城的海外發展會議（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作了一個比較。研究結果公佈如下：

	一九七六年中期人口總數（百萬人）	一九七四年按每人計劃的國民生產總額（美元）	生活品質指數	按人計劃國民總生產，在九六五至七四年間的成长率
中華民國 大韓民國	八三六·八 一一六·三 一六六·三 三四·八	三八〇〇〇 八一九〇〇 四三〇〇〇	（八五〇詳八九）	八三六·四 七五九·六
中華民國 大韓民國	出生率（千分比）	死亡率（千分比）	平均壽命（歲）	嬰兒死亡率（千分比）
中華民國 大韓民國	二二·七 二二·三 二二·九 二二·六	一〇·五 九九·九	六六·六 六六·一 六六·九 六一·二	（二五·四不詳 七·六詳）

	識字(百分比)	總出口(一九七五年百萬元)	總進口(一九七五年百萬元)	國際儲備金(一九七六年九月,百萬元)
中華民國	八二·五	五、六〇〇	一〇、四〇〇	(不詳)
北韓國	(不詳)	(不詳)	(不詳)	(不詳)
大韓民國	八·八	四、六七〇	七、二〇〇	一、六二九
				(不詳)
				二、三七四

參見 John, W. Swell 等著,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Development Agenda 1977* (New York: Praeger, 1977), 附件 A 三, 一六四—一六八。可以肯定地說, 一九七四年以後, 中華民國的經濟與社會指示數更加優越, 因為中共的發展說什麼受了「四人幫」及其他政治不安影響變得更加遲緩。

與確是這些美滿發展的重大因素。以下分析美國在東北亞的利益以及華盛頓北平關係如何影響這些利益。

論者謂美國亞洲政策的樞紐在日本。但是作為東北亞的中心點與第三經濟大國的日本祇是一系列的海島, 缺小內陸作第二線防衛。日本必須與外國貿易以維持其安定與繁榮。它的安全一方面以依賴美日安保條約與美國核子庇護為主, 另一方面也極依賴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的安定。如果其西方與西南方鄰國的安全面臨威脅, 日本自己的安全與安寧也立刻遭受威脅。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的和平與安定對日本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 尼克森與佐藤於一九六九年「華盛頓會談」時所發表的聯合公報曾予以強調。一九七七年八月在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中共之前, 一百名日本的學者與評論家向卡特總統寄去一封公開信, 陳述在這個地區內安定對經濟繁榮的重要性, 他們並說:

「透過日本、大韓民國及中華民國的驚人成就的史實, 東亞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區更能表明, 在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世界中, 如何能夠達到和平與繁榮。對現狀作重大改變以危及這一情況必然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

一九七六年七月, 當時的日本首相宮澤向美國參議員曼斯菲爾德指出, 撤銷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將給予亞洲的均勢以「嚴重的打擊」, 所以美國不應採取「劇烈措施」以與中共關係「正常化」^②。

東亞最近的發展頗使日本人不安, 這些發展包括美國參與的下降, 蘇聯軍事力量的上升, 美國從大韓民國撤出地面部隊的計劃, 以及不斷出現的關於美國降低其與中華民國的外交與安全關係的談話。但是, 日本不是唯一感到不安的國家。前面說過, 韓戰以後, 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外交與安全關係, 和美國對東亞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的政策有密切連鎖。

美國與日本、菲律賓、大韓民國、中華民國、澳洲及紐西蘭之間的安全條約均係在五十年代初期所訂, 其內容也或多或少地相

註②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7, 1977.

註③ *Japan Times Weekly*, July 31, 1976.

同。對與美國訂有防衛協定的國家而言，美國廢棄其中任一條約必會使這些國家對美國的信賴發生嚴重懷疑。曾於一九六一—一九六六年任美國副國務卿的鮑爾（George W. Ball）對那些聲言美國對中華民國條約承諾可以以一筆或一紙聲明予以終止的人，斷然地答覆說，美國無法「拋棄我們對國民政府的安全條約，而不致嚴重地減低日本、韓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對我們的其他承諾的信心」^②。「另一位學者曾經問道：

「眼看美國如此絕情地放棄責任，我們北大西洋公約的盟友，或者還有以色列，對美國的安全保證還會有什麼信心？」^③可以確信，如果美國片面終止其對中華民國的防衛條約與外交關係，東亞將會發生變劇。日本很難抵抗北平的，試圖在經濟上孤立中華民國的壓力^④。中共所加於臺灣四週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的總合壓力將使這一地區所有國家的軍備增加，並帶來其他動亂的變化。

可以了解，華盛頓希望繼續改善其與北平的關係，而不致損及美國在廣大亞洲的利益。不幸得很，最近幾年來美國所作所為不能使亞洲人安心。不久前，一個美國的國會代表團遍訪日本、菲律賓、巴布亞—新幾內亞、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及伊朗的政府領袖及普通平民，發現他們對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未來角色懷有不同程度的不安，他們也擔心美國的撤退會遺留下一個真空狀況，此一情況勢將威脅他們的繼續成長與安定^⑤。即使除了日本以外，亞洲各國領袖們尚未就美國與北平關係直言不諱地警告美國，他們自然理解，美國一旦廢除其與中華民國的防衛條約，將不可避免地加速美國退出亞洲的過程。

在討論華盛頓北平關係的區域性含意時，也應思考中共在東亞可能扮演的角色。在中共的對外政策中，民族主義利益與革命利益的交界線究竟何在，學者們尚無一致的看法，但是北平對外政策的言論與行為清楚地表示，中共確實在一個長程的基礎上為一個極不相同的國際秩序而努力^⑥。中共統治大陸將近三十年，這一段歷史充滿不可預期與不可預測的事件，如果有任何東西可以描述

^② George W. Ball, "Against Cravenly, Yielding to Peking,"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1977.

^③ Ray S. Cline, "Statement Befor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ptember 29, 1977," (Mimeo-graphed), 32.

^④ Leslie H. Brown, *American Security Policy in Asia* (Adelphi Paper No. 132,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3-14.

^⑤ "Asians are Afraid of U. S. Retrea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February 2, 1978.

^⑥ 近年來美國學者通常壓低北平對外政策中的革命性質。但是，沒有學者完全否認革命目標對北平外交行為的影響。那麼低估革命目標重要性的人祇能說，在過去，北平口頭激進，行為謹慎且有節制。參看

A. Doak Barnett, *Uncertain Passage: China's Transition to the Post-Mao Era*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4) 245-315; Clement J. Zahlocci (ed.), *Sino-Soviet Rivalry: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66), 9-42; Harold C. Hinton, *China's Turbulent Quest*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35-162. For a compilation of peiping's foreign policy pronouncements in recent years, see Warren Kuo (ed.), *Foreign Policy Speeches by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 1963-1975*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6).

其未來的特徵，很可能那就是衝突而不是安定^⑳，雖然「四人幫」已被整肅，其他國家與中共交往，必須小心。一位學者曾警告說，祇要中共「覺得可在其與美國的關係中獲得實質利益，它可能不願積極顛覆美國所支持的或與美國友好的亞洲政府，以免其與美國的關係緊張化。這種行為是否只是一切為制俄的一項策略性的妥協，殊難斷言」^㉑。

卡特政府也許有新的體認，總統、國務卿范錫、國防部長布朗、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等高級官員在其談話中強調太平洋區域共同防衛條約的重要性與東北亞安定的重要性^㉒。這些聲明及時恢復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信譽。這也顯示，美國當局也許已開始理解，一個有活力的亞洲政策有賴於亞太地區的安定的維繫，維繫這一地區的安定則要加強現存的安全協定與合作努力。談到美國的北亞與西太平洋政策，美國參議員賈維茲最近在這一地區旅行後所寫的報告，值得長篇引述：

「：就安全觀點而就橫的相互關係和相互支援的觀點看，日本、韓國與臺灣形成一個整體，成為美國在北亞與西太平洋區域的安全地位的基礎。當然，日本是這一整體的中堅，而日美聯盟乃是維繫北亞和平與安全的樞紐。因此，把三個國家作為一個集合體看，乃是美國西邊安全邊界的主要部份。這是美國安全不可或缺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業民主世界聯盟體系的重要成份……」

「日本韓國臺灣三角體中任何一個分子個別的弱化，就會削弱這一整體，並因此傷害北亞的整個安定與和平。這三個國家如果各自單獨存在——即使日本基於歷史的與心理的原故——皆易遭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所施加的壓力。但是，這三個國家站在一起就能够抵擋這些壓力，如果加上美國的明智與遠見的支援，就能够繼續成為北亞與世界的主要安定力^㉓。」

因此，從區域的觀點看，美國應該加強其與日本大韓民國中華民國三角體的關係。華盛頓北平關係的進行，決不應損及美國對東北亞三個盟友的支援。

三 華盛頓北平關係：雙邊觀點

檢討了華盛頓北平關係的全球與區域性意義後，以下檢討它們之間的雙邊關係。

註⑳ Lucian Pye, *China: An Introduc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註㉑ Leslie H. Brown, 同⑳, 頁一七。

註㉒ 參見，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美國總統卡特在北卡羅來納州威克·福瑞斯特大學的演詞；美國國防部長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在夏威夷檀香山的記者招待會；范錫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向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就一九七九會計年度外援預算所作的證言；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就亞太事務向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所作的報告。

註㉓ Jacob K. Javits, 'Washington's Connections: Tokyo, Seoul and Taipei,' *The Asia Mail* (March, 1978).

自從尼克森與周恩來於一九七二年二月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後，華盛頓和北平皆曾重申，堅守公報原則^⑤。但是，公報的意義含糊不清，至少其法律地位不確定。

北平堅持，「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事務，別國無權干預，所以北平一貫地提出三項要求——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毀棄共同防衛條約、撤退軍事力量——作為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一些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聲辯說，美國如欲與北平迅速正常化，就必須接受這三個條件，因為這些條件似乎隱含在「上海公報」中。

但是，就「上海公報」的文字看，美國僅同意，當「臺灣問題」確可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時，美國將從臺灣撤出軍事力量。美國和中共雙方對中華民國與美國外交關係及共同防衛條約皆隻字未提。事實上，美國當時的總統尼克森在赴中國大陸之前，曾在其世界報告中說：「……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會談，不會犧牲友人……同中華民國，我們將維持我們的友好，我們的外交關係，以及我們的防衛承諾……」^⑥季辛吉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以及在「上海公報」發表後，皆曾重申此意^⑦。

一九七二年以來，美國政府屢屢重申其對中華民國的條約承諾。在「上海公報」上，美國未曾承諾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與廢棄共同防衛條約。

一九七三年美國與中共雙方協議設立聯絡辦事處，此後華盛頓北平關係沒有多大進展，於是一些美國學者主張，按照中共的三個條件進行「正常化」。他們還說，他們無意傷害中華民國，因為縱然把外交承認從臺北轉向北平並終止共同防衛條約後，臺灣的現狀仍舊一樣。茲將他們的見解綜述於後：

(一) 日本模式在東京北平關係上行得通，同樣的也可以應用於華盛頓北平關係上。

(二) 共同防衛條約係訂於冷戰期間。現在，這一條約已不相干和無關重要。此外，縱然臺灣地區爆發戰爭，美國人民也不會支持美國的軍事介入。

註⑤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一日卡特總統在其記者招待會上作出他最新的聲明，他說，公報「對我們有約束力」、「我充份支持」，同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也有約束力。」

註⑥ Richard Nixon,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ebruary 9, 1972), 載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LXVI, No. 1707 (March 13, 1972), 330.

註⑦ 當詢及對中華民國條約承諾時，季辛吉回答說：「關於這個問題，在總統的世界報告中我們業已聲明了我們的基本立場，我們說，這個條約將予維持。這一立場至今未變：世界報告的立場屹立未動，也未作變更」。「President Nixon's Visit to the PRC—News Conference of Dr. Kissinger and Mr. Green」(Shanghai, February 27, 1972),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LXVI, No. 1708 (March 20, 1972), p. 428

(三)美國沒有必要要求北平不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因為由於國內與國外的限制——諸如，北平軍力微弱、莫斯科與北平的敵對形勢、北平對華盛頓與東京的依賴、中華民國的軍事力量——，北平不可能對臺灣使用武力。

(四)中華民國在軍事上強大，政治上安定，經濟上繁榮；它可以承受與美國斷絕外交與軍事關係的打擊。

(五)如果現在不撇開「臺灣問題」以便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華盛頓北平關係可能惡化，美國也可能介入一個新的戰爭中。這些主張經得起細密研討的考驗嗎？

第一、所謂「日本模式」與現實情況風馬牛不相及。日本把外交承認從臺北轉向北平後，其所以能夠與中華民國維持實質關係者，乃是由於美國維持其對中華民國的承諾^②。尤有進者，若說中華民國與日本的實質關係未曾受損害也是絕對不確。日本對十大建設的投資微乎其微。日本投資者似乎祇投資於短期建設。此外，航空協定事件也清楚說明，中共可以再度對日本施加壓力以阻絕東京與臺北間現存的經濟關係。

即使目前，華盛頓與臺北間外交與安全聯繫尚未中止之時，中共正對那些與中華民國維持貿易與其他聯繫的美國公司施加壓力。可以肯定，一旦華盛頓與臺北斷絕正式關係，中共將加大這種壓力。因此，日本模式不是美國所能採用的模式，因為它不符合美國安全的需要，最後也不能真正符合與中華民國維持實質關係的需要。

第二、一九五四年所簽訂的中美共同防衛條約乃是為了維持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定的若干條約之一。它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到臺北五年之後簽訂的。其效力及於中華民國政府所控制的地區——臺灣與澎湖。條約效力無限期。至今環境未有重大變更，也無重大違約事實，使美國有理由片面毀約。

中華民國忠實地履行條約的義務，強化其自由制度，改善國民經濟與人民福祉，加強武裝力量的戰備與防衛能力。在今天該條約對中華民國安全的重要性，與一九五四年無異。中華民國擁有五十萬訓練與裝備均優良的武裝力量，「繼續對綿延於日本與印尼間的東亞海島系列的安全作出主要貢獻，美國在全亞洲外緣的重要航運線的安全有賴於這個海島系列的完整，因此美國西太平洋的戰略防禦亦有賴於此^③。」若說共同防衛條約對中華民國與美國不相干和無關重要是不確的。

有些人士宣稱，於一九七三年戰爭權力立法和一九七五年越南失敗後，美國人民將不會支持美國在臺灣地區的軍事努力，即使中華民國遭到武裝攻擊。所以，共同防衛條約的延續與廢止毫無區別。一位美國學者曾針對這種說法評論道：

註② Robert A. Scalapino, "A Statement for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ptember 20, 1977 (Mimeographed), 15-16.

註③ Ray S. Cline, 同②, 頁十一。

「如果我們在一个完全抽象的情況中，於缺乏任何事件或顯然可以理解的威脅時，根據想像的或實際的輿論來測量我們承諾的效力，那麼沒有一個美國的承諾是可信的。但是一旦危機出現，人民與政府的反應將完全兩樣^④。」

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承諾雖然是以抽象的考慮為根據，而美國人民依然十分願意予以支持。一九七七年七、八月間美國布朗大學對意見領袖所作的調查顯示，高比率的美國人贊成與中華民國維持軍事聯繫。其結果是：百分之二無意見，百分之五贊成降低介入至僅可售武器；百分之十六贊成把介入降低至非正式的安全保證與出售武器；百分之三十六贊成維持正式安全保證並提供軍援；百分之四十贊成現有安全承諾與駐軍^⑤。根據這一最近的調查，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六的美國意見領袖贊成與中華民國維持正式的軍事聯繫。

第三、中共一再公開地宣稱，他們不排除使用武力以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華國鋒曾命令「人民解放軍」作好一切為「解放臺灣」所需的準備^⑥。如果美國一旦改變外交承認，北平顯然不容忍華盛頓與臺北間的軍事聯繫。如果現在中共已攻擊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那麼華盛頓承認北平後，這種攻擊勢將更加猛烈。在這種情形下，實在難以想像，美國如何能夠與中華民國繼續其正常關係。

毫無疑問，中共將試圖改善其武裝力量以便向中華民國挑戰，經濟上孤立臺灣，運用政治壓力與軍事威脅，在臺灣製造驚慌與失望的情緒。美國失去合法地位後，要想在臺灣地區扮演一個維持長久和平與繁榮的角色，將是極其困難的事。

第四、如果說，中華民國強大、安定與繁榮，所以美國應償之以撤銷承認與終止安全條約，殊非合乎邏輯。與中華民國相比，日本與北大西洋公約國家更加繁榮，其中很多更加強大，但是仍舊需要美國的安全承諾。為何中華民國被選為第一個與美國斷絕安全協定與外交聯繫的盟邦？

第五、到現在為止，華盛頓與北平間正進行着貿易與交流，保持着接觸點與正常的溝通。缺乏外交關係決不是兩者關係受限制的原因。如果美國必須作重大讓步以避免其與北平現存關係的惡化，那麼這一過程將永無止境。

而且，如果過去的經驗可作指針的話，可以發現，與中共有完全外交關係的國家通常與北平沒有維持密切的聯繫。沒有理由相

註④ Robert A. Scalapino, 同③, 頁三十。

註⑤ Michael Y. M. Kau, Pierre M. Perolle, Susan H. Marsh and Jeffrey Berman, "Public Opinion and Our China Policy," *Asian Affairs*, Vol. 5, No. 3 (January-February, 1978), 141.

註⑥ Hua, "Government Report, 1978," 同③, 頁三十五。

信，美國撤銷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就會贏得北平長久的感激與尊重。相反的，美國人將被北平視為失敗主義者^④。

到目前為止，北平從這種新關係中所獲的利益遠比華盛頓為多。美國已解決了現已不存在的中南半島問題（部分由於中共之助），並以爲能够利用北平對付莫斯科；而中共的收穫則有：美國軍隊退出中南半島，與中國大陸軍事衝突的可能已消失；美國默然支援中共以禦蘇聯；與美國通商並輸進技術；與日本及西歐關係得以改善；在聯合國中代替了中華民國；擴張外交關係，使中華民國受到損失；美日關係緊張^⑤。

中共是一個完全被控制的社會、經濟與社會福利貧乏。中華民國是一個多元主義的社會，其經濟與社會紀錄爲亞洲最佳者之一。在廣泛的人權——公民的、政治的、經濟及社會的——領域內，中華民國的紀錄遠勝於中共。美國人民與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的進步曾作出極大貢獻。維護人權的美國政府應該阻止這種進步嗎？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人民的意志應該是政治行動的指針。在這方面，美國民意測驗始終顯示，極大多數美國人民，縱然希望美國改善其與中共的關係，仍贊成維持其與中華民國的現存關係，包括外交關係與共同防衛條約^⑥。

四 美國對中國政策中的原則與利益

在美國有一個新的、有勢力的思想派別，他們主張一種以選擇介入爲基礎的對外政策，按照這一方針：美國應該區別主要利益與次要利益；保護歐洲、日本、或許中東等主要利益地區；凡是無關重大安全利益的其他地區，不作軍事戰略性的介入。

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個聰明的方針，但是這不是所需的答案，因爲它既不完備又有非常嚴重的缺陷。法國傑出的學者亞倫（Raymond Aron）把這些缺陷一語道破，他說：祇有小國家的「抱負才局限於實際的生存與合法獨立及典章制度的保全」。另一方面，一個大國的「行爲則超越實際的安全、道德的留傳與居民的福利，追求一個往往定義不清的目的，我把它稱名之爲，維護或創

註④ 例如，毛妻江青於一九七五年曾以下列方式評估尼克森——季辛吉在中共的談判：

「在談話中，季辛吉默示，美國有意放棄太平洋上的亞洲地區。季辛吉同歷史上每一個反動階級的政治家一樣。他祇是一個冒險家和失敗主義者。尼克森與季辛吉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追求的權力政治至今已不切實際。美國必須重返現實世界。它不能繼續干涉他國的主權與利益。季辛吉談到權力平衡。這表示，他承認矛盾的存在，但是在鬥爭的新條件下他不去尋求解決矛盾之道。相反的，他想避免對立。這是一個舵鳥政策。」

原文由 *China News Analysis* (香港) 譯成英文，載一九七五年六月一〇日該刊。轉引自 Oscar Gass, 'The "Normalization" of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Review*, April 1978, 37-38.

註⑤ Donald Brandon, 同④, 九四—九五

註⑥ 關於對這一主題的最近發現的要點，請參見 Ralph N. Clough 等之著作，同④, 一三三—一四七。

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⁴⁶。

亞倫所說的就是，權力不是人類行為唯一的、而且往往不是主要的決定要素。「外交家在一個業已由憎恨、原則或同情所構成的世界中思想和行動，不能把這些縮小成爲：衡量權力與考慮均勢⁴⁷。」易言之，一個大國不僅關心佔有目標，而且關心環境目標。

在一切國家的對外政策中，利益與原則，權力與目的是相互糾纏難分難解的動機，二者的相互混合比例雖然經常不同。當利益的要求與原則的要求，權力的考慮與目的考慮相符或相互增進時，這一個國家就可實行一個最有效的與前後一致的對外政策，並獲得國內的最大支持。就原則與目的看，美國及其東亞盟國的政治與經濟價值及成就遠遠超過東亞的共產黨國家。前者的生活品質與人權的指數也大大高於後者。因此，不難堅持，美國及其東亞盟友所實踐者在道德上優於共產黨徒所實踐者。美國及其東亞盟國有權維護他們的價值與原則，以及奠其基上的政治制度，並盡可能與謹慎地予以推展⁴⁸。卡特總統的全部人權外交亦應由此一角度加以體認。就利益層次看，極爲明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利益，乃是加增與其心意相同的國家的關係，提高政治、經濟與安全合作，抑制極權勢力的擴張。共產黨國家不接受美國的基本價值，而是美國及其亞洲盟邦的價值的一個威脅。四分之一世紀的經驗告訴我們，當美國維持其承諾，並作爲日本、中華民國及大韓民國之間的共同鏈鎖之時，就有和平、安定與繁榮。

如果說，倘若美國不按照中共的條件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對美國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這是一個極大的曲解。中共不是一個超級大國或即將升起的一個超級大國。中共的經濟脆弱，人民貧窮，軍力有限。誠如一位深思熟慮的評論家所說：

「……它（中共）毫無能力把其軍事力量投入世界舞台，甚至不能自保其邊界。也沒有任何東西暗示，中國（中共）將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在三十年內成爲一個超級大國。因此，右傾熱愛中國者，雖然厭惡中國（中共）制度，但在中國（中共）權力中見到反制俄人的效力，因此他們與左傾熱愛中國者一樣有缺點，後者看中了一個極不自由與極低效率相混合而成的社會⁴⁹。」

作爲一個全球性強國，且在亞太地區肩負有歷史責任，美國於處理其臺北與北平以及漢城與平壤關係時的方式不僅影響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而且影響整個亞洲。如果北平堅持三個條件，那麼華盛頓與北平間當前的關係，對兩個如此差異的社會而言，是相

註⁴⁶ Aron, "Is Isolationism Possible?" *Commentary*, (April 1974), 41, 43.

註⁴⁷ 同⁴⁶，頁四一。

註⁴⁸ James E. Dornan, Jr. & Peter C. Hughes, "Power and Purpos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dern Age* (Spring 1975), 167-179, esp. 176-177.

註⁴⁹ Edward N. Luttwak, "Seeing China Plain," *Commentary* (December 1976), 33.

當正常的。美國永遠不應容許其敵人擺佈或傷害其與長期友人的關係，以作為改善其與敵人關係的條件^⑤。原則與利益兩者皆要求美國鞏固與其歷久彌堅的友人的關係。

中華民國的立場，在官方的聲明中，昭然若揭。這一立場係以自助與互助為基礎。政府與人民們將繼續努力以求經濟進步、財富分配平均、增進社會福利、壯大國防力量。我們將繼續尋求盟邦與友好國家的合作。我們正面臨一項國際威脅——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共產黨徒之間雖有爭執，但在世界共產主義文化的最後目標上，他們聯合一致。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面對共產主義威脅。祇有心意相同的國家結成一個共同陣線，我們才能希望阻遏共黨的進一步擴張，保衛我們全體的自由。

此外，我們是、而且將繼續是國際體系的積極的一員，促進貿易、投資、技術與文化交流。我們相信，安全、自由、繁榮與進步祇有透過堅決的自助與相互合作才能獲致。

註⑤ Paul Seabury, "The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and Europe," *Forum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 (Taipei: Asia and the World Forum, 1977), 3—8.

越戰後的中共亞洲策略

* 沙 特

一 前言：北平對於亞洲權力平衡的認知

一九七二年二月，經由尼克森總統訪問北平所達成的美毛修好，是中共外交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對於增進中共在亞洲權力平衡的利益來說，美毛之間的外交關係正常化是很有用處的。在六十年代後期，中共的領導人更加體會到他們脆弱的戰略地位。文革期間對於軍事準備的破壞以及蘇俄在邊界地區駐軍的增加，使得中共易受攻擊。不過，問題的重心在於中共的堅持反對二個超級強國。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入侵捷克，同時發表所謂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論，這明白表示了它可能準備使用完全的軍事優勢，壓迫

* 沙特原名 Robert G. Suttler，美國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處亞洲事務研究員。